

全球智库半月谈

新兴市场的孪生危机

财政乘数：大小，决定因素与使用

埃博拉爆发带来的经济冲击

全球贸易增长减速：周期性原因还是结构性原因

重新校准对中国的态度

APEC 峰会体现定义亚洲地区的困难

本期编译

高 歌

郭 楚

郭子睿

李 想

刘 洁

刘天培

刘兴坤

沈仲凯

苏 丹

许平祥

杨 原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新兴市场的孪生危机 4

导读：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是目前摆在欧元区所有国家面前的核心问题。本文描述了银行和主权债务危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孪生危机”发生的过程。进一步的事实则表明，在“孪生危机”中，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谁先发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危机背后的驱动因素、传递渠道以及对实体经济影响。

耶伦关于不平等化的担忧忽视了美联储的作用 7

导读：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会议发言中提出：“我现在极为担忧美国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化程度。”对此，她却并没有意识到美联储在过去六年内拼命压低利率的行为也助长了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不公。未来美国应建立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体系，规范美联储的权力，降低不确定性，继而保障美元价值。

财政乘数：大小，决定因素与使用 9

导读：本文认为发达经济体的财政乘数在“正常”时期，通常位于0至1之间，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数，但在“非正常时期”，财政乘数可能大于1；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乘数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并且支出乘数与税收乘数大致相等。影响财政乘数大小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体正常时期，影响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如贸易开放度，汇率制度等；另一类是使乘数偏离正常水平的失常因素，如经济周期等。在使用财政乘数评估财政政策对GDP的冲击时，应该考虑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交叉重叠影响等因素。

全球治理

埃博拉爆发带来的经济冲击 11

导读：埃博拉爆发不仅仅损害了当地的公共卫生系统，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冲击。尽管目前还没有声音来讨论埃博拉带来的经济影响，但是这种讨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与国际组织应该在未来打造更为强有力的制度，应对危机。

21世纪需要更好的G20和全新的G7+ 12

导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作用的20国集团(G20)，但危机后却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对于如何进行全球治理结构性改革，作者认为应该构建新的领导集团，即新七国集团(G7+)，在维护合法性和代表性的同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

全球贸易增长减速：周期性原因还是结构性原因 17

导读：全球贸易增长经历2008-2009年“贸易大崩溃”后成功实现反弹，但2011年转而明显减速，2012和2013年增长率仅为3%。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贸易增长的衰退呢？为此，本文首先列举了部分贸易衰退的典型事实，其中发达经济体下滑尤其明显，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大多数区域也都受到影响；其次，运用贸易模型考察并发现，大部分

衰退源于周期性因素；在结构性因素中，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

经济政策

APEC 之自由贸易协定争夺战 21

导读：尽管 WTO 上的贸易对话面临崩溃，APEC 峰会继续推动了全球贸易协定的确立。本文认为，中国与美国正对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展开“争夺战”。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将面临中国主导的“北京纲领”的挑战。然而，文章认为，二者之间的争夺战不是解决办法，只会对全球贸易带来混乱和不稳定。

QE 退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有限 23

导读：2014 年 10 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停止继续购买长期国债与 MBS，意味着美联储已经迈出退出 QE 的第一步。这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笔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尚未收到全面冲击，但是中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准备。

聚焦中国

中国未来贸易谈判中的国企问题 26

导读：未来中国将在多个区域及双边贸易协议中有所作为，在这些谈判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本文着重讨论四个在谈判中重要的子问题，分别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反垄断法；国有企业在政府采购协议中的地位，国企、私企相对力量的改变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以及国企补贴问题。

重新校准对中国的态度 30

导读：美国的再平衡进程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作者认为美国需要在经济和其他非安全问题上下功夫，以此为契机解决棘手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三大具体措施：利用 APEC 峰会和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让中美关系回归正轨；重视双边投资协议；落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战略观察

维也纳会议后伊朗核问题的前景和障碍 32

导读：11 月 18 日至 24 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在维也纳开始举行。此轮谈判是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商定期限内的最后一轮谈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此次会议后伊朗核问题的前景如何？还存在哪些障碍和挑战？查塔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理查德·道尔顿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应当取消——而不仅仅是暂停——对伊朗的制裁，同时找到一种非歧视性的解决途径。

APEC 峰会体现定义亚洲地区的困难 34

导读：2014 年 11 月 12 日，英国著名智库网站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刊登了题为《APEC 峰会体现定义亚洲的困难》的文章。学者布莱斯林在文章中指出，对亚洲地区的定义实质上体现的是这一地区的权力争夺，而真正有效的区域治理应当依靠功能性机制的作用。

迈向新的正常化关系：美越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 36

导读：2014 年 9 月 18 日美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表文章《迈向新的正常化关系：美越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作者回顾了美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给出在新形势下推进美越关系朝向更深入发展的建议。

本期智库介绍 38

新兴市场的孪生危机

Irina Balteanu, Aitor Erce /文 苏丹/编译

导读：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是目前摆在欧元区所有国家面前的核心问题。本文描述了银行和主权债务危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孪生危机”发生的过程。进一步的事实则表明，在“孪生危机”中，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谁先发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危机背后的驱动因素、传递渠道以及对实体经济影响。编译如下：

通过对不同类型危机发生前后经济体动态过程的详细分析，本文发现不仅单一危机和孪生危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孪生危机中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先后次序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本文的结论对进一步的理论建模提供启示。

高财政赤字和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共存，使得当前大多数欧元区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在一些国家，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不得不开启大规模救助，从而引发财政困难（例如爱尔兰）。在另一些国家，潜在的主权债务危机则使得该国主权债务评级不断下调，从而对国内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破坏（例如希腊）。尽管对市场来说，财政困难和银行危机的紧密联系显而易见，学术上对于这两类危机之间联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虽然一些研究初步探讨了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关联，但对于彼此之间传递渠道的研究还很少。

1. 数据和方法

研究样本包括从 1975 年至 2007 年间 78 个新兴国家的数据。主权债务危机定义来自于标准普尔，银行危机的定义则依照 Laeven and Valencia (2013)。通过整合这两套标准，我们进一步地将危机分成四类：单独发生的银行危机，单独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首先爆发的“债务—银行孪生危机”，以及银行危机首先爆发的“银行—债务孪生危机”。因此在样本区间内的 140 个危机中，51 个是单独发生的银行危机，61 个是单独发生的债务危机，15 个是“银行—债务孪生危机”，13 个是“债务—银行孪生危机”。在实证模型中，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宏观—金融变量，包括一些反映直接资产负债表影响的变量（例如银行公共债务持有比例，中央银行信贷等），以及一些反映危机和政策对实体经济非直接影响的变量。本文采取事件分析方法来估计不同变量的条件期望大小和距离不同类型危机发生时间长短之间的关系。

2. 银行—债务孪生危机

在单独发生的银行危机和“银行—债务孪生危机”两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一般银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在单独银行危机发生之前，银行对政府债券的持有量很少，并且央行通常会提供高流动性的支持。危机发生之后，流动性大幅降低，但银行持有公共债券的数目也开始逐渐

积累。然而，在“银行—债务孪生危机”发生之前，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政府债务持有量会迅速增加，但央行提供的流动性的变化则并不显著。在危机发生之后，流动性程度显著增加，但银行对公共债务持有量的增加速度减缓。

这些显著的差别可能和初始冲击的来源，央行和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银行部门结构特征等都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在“银行—债务孪生危机”发生前后，银行系统资产规模通常都很庞大。因此当面临金融危机时，银行系统也需要非常大数额的救助，这使得危机的发生对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加严重，对外国投资者信心的影响程度也更为显著。在单独发生的银行危机中，事实上危机前银行规模就已经有所下降。伴随着危机的发生，银行规模下降程度也越来越大。然而在“银行—债务孪生危机”中，直到银行危机发生的后半段，银行规模才开始下降，并且下降速度也非常缓慢。

表 1. 银行危机

Crises types	NPL at peak	Change in number of banks	Fiscal costs	Recapitalisation costs (gross)	Recapitalisation costs (net)
'Single' banking crises	27.59	-18.90	12.99	6.06	4.87
Bank to debt crises	35.34	-22.00	25.51	14.22	9.33
Debt to bank crises	35.90	-43.40	4.87	1.92	1.92
Total average	30.02	-23.31	14.21	6.94	5.24

数据来源：Laeven and Valencia (2013)，标准普尔，以及作者的计算

3. 债务—银行孪生危机

通过比较单独发生的债务危机和“债务—银行孪生危机”，我们可以发现在“债务—银行孪生危机”中，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更多，并且增加速度也更快。此外，在危机发生时点的附近，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也比正常市场环境下要大的多。然而对于单独发生的债务危机，流动性支持的变化则一直比较平稳。此外，银行部门规模在发生“债务—银行孪生危机”的国家中普遍要更小一些，并且也几乎没有外国资本流入到经济体之中。这些显著的差异表明“债务—银行孪生危机”会更加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并且也会极大限制政府提供大规模救助的能力。

4. 次序的重要性

除了单独危机和孪生危机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我们上述分析结果也表明，考虑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先后次序之后，孪生危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在预算赤字，通胀率，私有部门的信贷以及资金流上。这些都是之前的文献所没有提到的。

本文原题为“Linking banking crises and sovereign defaults in emerging markets ”。本文作者 Irina Balteanu 和 Aitor Erce 均为西班牙央行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耶伦关于不平等待的担忧忽视了美联储的作用

James A. Dorn / 文 刘洁 / 编译

导读: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会议发言中提出:“我现在极为担忧美国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化程度。”对此, 她却并没有意识到美联储在过去六年内拼命压低利率的行为也助长了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不公。未来美国应建立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体系, 规范美联储的权力, 降低不确定性, 继而保障美元价值。编译如下:

在波士顿联储关于经济机遇与不平等会议上, 美联储主席耶伦提出:“我现在极为担忧美国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化程度。”而她却没有意识到美联储在过去六年内拼命压低利率的行为也助长了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不公。

美联储保证其货币目标利率几近为零, 大力推进量化宽松以降低长期利率, 这实际上助长了风险, 扩张了金融市场, 促使政府以廉价成本举债, 从而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

美联储的金融压制政策使实际利率持续为负, 对政府和房地产的偏爱导致资本错配, 并以牺牲私人部门的利益为代价。美联储自 2008 年 10 月开始为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 并实行严苛的资本金要求, 从而防止准备金增加对银行贷款、名义收入上涨以及通货膨胀造成冲击。同时, 本应承担更多风险的高收入群体也得以从美联储的刺激政策中获利。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推行了量化宽松, 并实行超低利率以促进投资、创造“财富效应”, 旨在提高消费水平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他仍然相信信用增长——而不是低利率——是资产泡沫的主要来源。但这忽视了一个事实, 即美联储实际上为这种增长提供了基础货币。耶伦暂时终止了量化宽松, 但她认为利率应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

美联储曾声明反对运用其政策手段抑制资产泡沫, 但它却用这些政策手段来支撑金融市场——也就是说, 它正在做一件它所曾反对过的事情。市场参与者已经从艾伦·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看跌期权中获益, 并且在耶伦保证低利率政策的条件下仍在继续获益。

1913 年联邦储备法试图提供一种“弹性货币”以防止恐慌。当时, 美国仍实行金本位制, 也无公开市场操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直至 1933 年银行法推出后才建立, 直到 1977-78 年才要求实行双重使命, 当时联邦储备法得到修订, 要求美联储维持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此外, 美联储还要负责实现“适当长期利率”的目标。然而, 法案中并未提到促进平等机会或降低不平等程度的相关内容。

耶伦在演讲中提到了“对不平等与机遇的视角”, 她指出“美国人将机遇平等视若珍宝”。她还意识到“收入上的一些变化也会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这会促

使人们工作更努力，不断获得教育、储蓄、投资，并承担风险。”然而，耶伦警示到，“收入不平等会加剧机会不平等，因此会产生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恶化。”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央行，美联储实行的超低利率导致风险增加，资产泡沫滋生，同时抑制储蓄和资本投资，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收益膨胀，而耶伦对美联储发挥的这种加剧不平等化的作用三缄其口。

当前，货币政策没有任何指示可循；政策制定者也没有可依据的货币规则。我们处于一个完全法定货币的世界中，对美联储来说则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裁定权。这种环境会滋生不确定性，同时忽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伯南克认为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货膨胀目标太低了；3% 或许更适当。其他经济学家甚至建议更高一点。但价格稳定的目标怎么办？当然，通货膨胀其实是对实际现金余额征税，扭曲相对价格，并使借款人受益、贷款人受损。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至 3-4% 或更高，名义利率也将上升。拥有庞大美国债权的中国将遭受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债务缩水，美元疲弱，债券价格下跌。

美国人或许相信“平等机会”，但美国宪法并未涉及这一点。宪法允诺了平等权利而不是捐赠意义上的平等机会。从宪法角度来看，正义的本质是“游戏规则”保护人类和财产，且平等适用。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家 F. A. Hayek 所指的“正当行为规则”。个体都能从保障财产权的法规中获益，包括拥有稳健货币的权利。

美国货币政策应当列入宪法并由法规约束。1971 年金本位制的终结意味着黄金在美国货币体系中不具备任何作用。美联储也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现在是时候让国会重新审视宪法，敦促当局“规范”货币价值了。未来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建立多党委员会来规范美联储的行为，并且考虑设置一种新型货币来替代自由的政府法定货币。

美国需要建立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来限制美联储的权力，降低不确定性，继而保障美元价值。只有拥有了健全的货币和自由的市场，美国经济增长才能再度成为解决贫穷问题的驱动力。

本文原题为“Yellen’s Concern for Inequality Ignores Fed’s Role in Creating It”。本文作者 James A. Dorn 为华盛顿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财政乘数：大小，决定因素与使用

Nicoletta Batini, Luc Eyraud, Lorenzo Forni, and Anke Weber/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发达经济体的财政乘数在“正常”时期，通常位于0至1之间，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数，但在“非正常时期”，财政乘数可能大于1；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乘数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并且支出乘数与税收乘数大致相等。影响财政乘数大小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体正常时期，影响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如贸易开放度，汇率制度等；另一类是使乘数偏离正常水平的失常因素，如经济周期等。在使用财政乘数评估财政政策对GDP的冲击时，应该考虑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交叉重叠影响等因素。编译如下：

财政乘数是用来衡量政府支出或税收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程度。通常被定义为GDP的变动量除以引起这种变动的政府支出或税收的变动量。财政乘数对宏观经济预测和政策制定非常重要，准确的财政乘数有助于政府评估财政政策的影响并精确地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

1. 财政乘数的大小

DSGE 和 SVAR 模型表明，发达经济体在“正常时期”，第一年的财政乘数位于0至1之间。通常，政府支出乘数要大于收入乘数。Mineshima 等 (2014)认为发达经济体第一年的政府支出乘数为0.75，税收收入乘数为0.25。但在经济严重衰退或有货币政策配合的“非正常时期”，财政乘数可能大于1。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支出乘数不一定大于收入乘数。

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的财政乘数很难测定。仅有的几篇文献(Estevao 和 Samake, 2013; Ilzetzki 和 others, 2013; Ilzetzki, 2011; IMF, 2008;和 Kraay, 2012)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的财政乘数要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财政乘数。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支出乘数与税收收入乘数大致相等。

2. 财政乘数大小的影响因素

影响财政乘数大小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体正常时期，影响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另一类是使乘数偏离正常水平的失常因素。

结构性因素如下：

- 贸易开放度。进口较少的国家，财政政策更多的影响国内需求，通常财政乘数更大(Barrell 和 others, 2012; Ilzetzki 和 others, 2013; IMF, 2008).
- 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程度。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管制越严格，通常这个经济体的财政乘数更大(Cole 和 Ohanian, 2004; Gorodnichenko 和 others, 2012).
- 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大小。经济体的自动稳定器可以削减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越大，财政乘数越小。(Dolls 和 others, 2012)

- 汇率制度。汇率的变化可以平衡财政政策的冲击，因此汇率制度越灵活，财政乘数越小。(Born 和 others, 2013; Ilzetzki 和 others, 2013)。
- 债务水平。债务水平越高，利率风险溢价上升，抑制私人需求，财政乘数降低。(Ilzetzki 和 others, 2013; Kirchner 和 others, 2010)。
- 公共支出和收入的管理水平。当政府征税比较困难或支出效率较低时，财政乘数会变小。

失常因素如下：

- 经济周期。财政乘数在经济衰退期比在经济繁荣期要大。在经济繁荣期，财政扩张政策存在挤出效应，削减了财政政策影响。而且，在繁荣期社会供给资源的弹性较小，比如工厂完全开工或社会不存在闲散劳动力，这会进一步限制财政扩张的作用。
- 货币政策的匹配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低利率政策会缓冲财政紧缩的影响。当经济处于零利率时，财政乘数会大于正常时期的财政乘数。

通常，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在 5 年内消失，而且影响的程度呈倒 U 型，一般会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然而，影响的持续性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冲击的持续性；第二是财政政策工具；第三是上述的失常因素。通常，财政冲击越持久，对产出的影响越持久；公共投资和公司税收的变化要比政府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更持久；当经济体处于衰退期或货币政策不会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时，财政政策的影响更持久。

3. 财政乘数的使用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电子表格模板，利用财政乘数来评估财政政策对 GDP 的冲击。这个模板应该把财政乘数的估计值，财政冲击以及 GDP 的基准值和在财政政策冲击下的 GDP 变化路径联系起来。这样也可以用来评估 GDP 变化的持续性。一个好的模板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 模板足够灵活，可以用来模拟不同情形的冲击。尤其是，财政乘数的大小和持续性可以变化。
- 时间跨度足够长，比如 5-10 年，便于评估财政政策冲击的持续性。
- 基准 GDP 不应该受财政政策影响，也即是在无财政刺激的情形下的产出水平。可以使用潜在 GDP 替代，或者对潜在 GDP 序列做 HP 滤波得到。
- 考虑交叉重叠影响。比如，第二年预测的 GDP 应该考虑第一年财政刺激在第二年的影响和第二年财政刺激在当年的影响。

本文原题为“Fiscal Multipliers: Size, Determinants, and Use in Macroeconomic Projections”。本文作者皆为 IMF 财政事务部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埃博拉爆发带来的经济冲击

Daniel F. Runde 和 Conor M. Savoy /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埃博拉爆发不仅仅损害了当地的公共卫生系统，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冲击。尽管目前还没有声音来讨论埃博拉带来的经济影响，但是这种讨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与国际组织应该在未来打造更为强有力的制度，应对危机。编译如下：

埃博拉对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公共卫生系统和经济系统带来的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未来有可能继续蔓延到其它相邻的国家。

世行预计，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几内亚的 GDP 总额会减少 2.1%，利比里亚减少 3.4%，塞拉利昂减少 3.3%。政府财政也受到了影响，利比里亚损失了 9300 万美元，塞拉利昂损失了 7900 万美元，几内亚损失了 1.2 亿美元。这些损失非常巨大，因为这些国家本来就很贫穷。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内战结束后的 10 年中，两国经济迅速发展。比如，多达 160 亿美元的境外投资流入利比里亚。但是这种局势很有可能就此扭转。

一些经济部门已经发生了扭转。在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食品价格飞涨，进而可能导致动乱。利比里亚的经济支柱产业，矿产、农业和服务业，都受到影响。比如，一些矿产公司已经停产；橡胶和油的产量开始下降，使得出口商蒙受损失。

这些损失的背后是脆弱的制度和设施体系。当地的医疗体系在埃博拉的攻击下毫无应对之力。这三个国家还被认为是非洲崛起的新星，可想而知，如果埃博拉继续传播到别的国家，将会发生怎样严重的后果。

尽管国际援助给予了许多短期的物资和财政支援，但这些国家仍需要长期的支援计划。这个计划还包括如何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更加有韧性的制度，让它们能够更加有力地应对危机。

本文原题为“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Ebola Outbreak”。本文作者 Daniel Runde 为 CSIS 下繁荣与发展计划的主人，Conor Savoy 为美国发展领导计划的副主任的。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1 世纪需要更好的 G20 和全新的 G7+

Jim O'Neill 和 Alessio Terzi /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作用的 20 国集团(G20), 但危机后却失去了动力和方向; 对于如何进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 作者认为应该构建新的领导集团, 即新七国集团(G7+), 在维护合法性和代表性的同时,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编译如下: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期间, 20 国集团(G20) 迅速转变为“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在危机初期阶段, G20 论坛确实有效地遏制了危机; 然而, 随着危机的缓解, G20 貌似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各国政府首脑和决策者不再重视国际一致行动的必要性, 而是重新把精力聚集于其国内事宜, 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必须要承担的责任。然而,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永久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 以预防危机的再次发生, 而不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再采取行动。

全球贸易和财富创造模式的迅速变化, 使得 G20 必须进行改革, 特别是在其内部建立一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集团, 如新七国集团(G7+), 在处理主要经济问题时起到领导作用。为此, 欧元区成员国应该在 G7 中腾出位置, 以留给中国和其它大型新兴经济体。与此同时, 所有现已纳入 G20 框架的国家, 包括欧元区国家, 仍然保留在 G20 中, 以便能在全球框架中来讨论其他事务。

1.G20 在危机初期成效显著, 但目前已失去动力和方向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早期阶段, G20 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论坛机制, 在诸多方面成效显著, 包括: (i) 达成统一协调的财政政策; (ii) 增加国际货币基金资金的可获得性, 加强金融安全网络建设; (iii) 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形成《巴塞尔协议 III》(Basel III), 加强金融监管。然而, 随着经济逐步步入复苏, G20 在其它诸多方面, 如影子银行和衍生产品交易监管中, 达成一致的进程非常缓慢。在某些领域, 甚至已陷入停滞, 如关于跨境的系统性金融机构的问题。G20 的运行停滞引发的问题就是: G20 是否还是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有效论坛机制, 它的议程是否需要重新再聚焦, 以及未来的议程应该是怎样的?

布鲁盖尔(O'Neill 和 Terzi, 2014a) 最近基于 G20 的一项调查发现, 阻碍该论坛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是其过于广泛的议程和过于多样化的构成。虽然认识到组织本身治理的变化永远无法替代其主旨和目标, 但一些专家还是建议, 创建 G20 指导委员会或永久性的秘书处可能能够缓解以上问题。鉴于 G20 是由最大几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组成的, 我们拥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一个官僚机构是否能够简化议程, 有效决策。更直接地说, 没有人会听从 IMF,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听从 G20 秘书处呢? 与此同时, G20 论坛还远未能完全实现其宣扬实现可持续性平衡增长的宏伟目标, 在很多问题的决策过程中陷入踌躇不前, 包括: 维护健

全的公共财政，促进平衡的经常账户，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球增长潜力，防止资产泡沫，实施货币政策稳定物价以及保持汇率合理稳定。

世界经济增长确实已经开始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实际复苏步伐低于普遍预期。此外，全球债务占 GDP 的比例持续飙升。这一比例自从被 2009 年可持续发展框架提出以来，已被认为是引发本次危机的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仍有相当大的争论，债务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缓慢复苏或一个较低税收和较高支出的混合政策。许多新兴经济体将发达经济体继续上升的债务视为加于他们身上的负担，而当前世界货币体系及其治理仍然是由 G7 主导，这是进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尤其是，一些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表示，发达经济体中不可持续的公共财政和不断飙升的债务水平正在削弱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对其储备资产投资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金砖四国政治领导人或间接或直接地对七国集团主导全球治理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当涉及到货币问题时。与此同时，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低迷，这可能就是来自对债务水平上升的担忧。

然而，经常账户失衡问题逐步得到改善。自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程度都下降了 50% 以上，美国逆差降到了 GDP 的 3%，中国的顺差同样也已下降。尽管二十国集团无法在 2010 年首尔 G20 会议达成共识，但是经常账户失衡的改善已成事实。这不仅说明目前 G20 论坛的局限性，而且看起来它也并不是那么重要。欧元区的经常账户顺差继续上升，现在略大于中国。然而，相比之下，欧元区似乎纯粹是源于其成员国国内需求的复苏，特别是德国。尽管美国和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已经改善，但较少证据能够证明二者之间在消费方面的平衡。相比其他经济体，中国的私人消费仍太低，而美国则太高。

总之，自从 2008 年底以来，G20 负责接手全球经济治理，它在遏制全球经济衰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促进形成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以及构建一个更好、更公平的全球治理结构中是否有效，目前尚不清楚。

2. 建议

基于 G20 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在非危机时期，二十国集团不太可能成功地实现其目标，这很大程度上由于成员构成的复杂性和议程的过于广泛。由于有太多的成员和议程，虽然最终的决定很重要也很深远，但如何保证及时性却是个问题。全球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框架呢？首先需要能具备做出迅速行动的能力；要与当前的 G20 一样，精简且具有合法性；同时要能形成有意义的决议，特别是当它涉及全球经济问题，如经济失衡和货币问题时。1985 年的 G5 集团（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避免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也主导了美元的再平衡过程；然后是 1987 年的七国集团（G5+加拿

大和意大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是一个处理未来重大决策问题的有效论坛。相比之下，G20 是一个笨拙的集团，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只有在另一个危机爆发时，才可能形成果断有效的行动”。

对此，我们构建一个新的框架，称之为新七国集团（G7+）。如表 1 所示，与原 G7 相比，中国和印度将作为新成员被纳入，欧元区的三个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将退出，取而代之是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中国、欧元区、印度、日本和美国将处于该新集团的核心。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两个重量级国家—巴西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体量都比印度的要大（如表 2），所以也应该被纳入。另一个方案是保留加拿大和英国，由此集团扩展为 G9，或者剔除巴西和印度形成一个简约的 G7。

表 1 G7、G7+和 G5 的构成

G7	G7+	G5
加拿大	巴西	中国
法国	中国	欧元区
德国	欧元区	印度
意大利	印度	日本
日本	日本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美国	英国	
	美国	

虽然加拿大广受尊敬，但除了历史原因之外，很难支持其应该继续保留 G7 资格（例如为什么是加拿大，而不是澳大利亚）。鉴于英国在全球金融服务中的地位，其位置更微妙；但如果把金融监管问题放到 G20 框架之中，那么支持英国保留的力量将大幅削弱。全面考虑之后，我们建议四个金砖国家应该加入，日本、欧元区、英国和美国作为新七国集团（G7+）的核心组别。

就全球合法性而言，G7+的人口小于 G20，但比目前的 G7 仅代表超过 10% 的世界人口要多很多。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而言，G7+表现的更好：只有八个核心国家，但却可覆盖超过 80% 的全球经济体量。这也使得中国能直接加入到一个更小、更负责的集团。至于欧元区国家，此举将给出形成永久的货币联盟的巨大信号，这甚至可能成为其真正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标志。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G7+ 占世界份额 50% 以上，未来的几年还会持续增加(由于

中国上升的作用)。相比之下,目前的 G7 自 2000 年初以来一直低于 50%, 未来还将快速下跌。总之,小范围的论坛就己能满足领导人的公开交流,并促成重要的贸易协定,帮助在后 WTO 时代改进贸易的多边主义,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诉求。

表 2 GDP 和金融资产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情况

国别	GDP 占比 (以市价汇率计算)	GDP 占比 (PPP 计算)	金融资产占比
美国	22.4	16.4	40.8
欧元区	17.1	12.3	17.3
中国	12.7	15.8	8.9
日本	6.6	4.6	9.9
德国	4.9	3.4	4.4
法国	3.8	2.5	3.7
英国	3.4	2.3	5.0
巴西	3.0	3.0	1.0
俄罗斯	2.8	3.4	0.4
意大利	2.8	2.0	3.3
印度	2.5	6.6	0.9
加拿大	2.4	1.5	3.0

数据来源: IMF WEO, October 2014, 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4.

此外, G7+ 将包含超过 84% 的世界金融资产, 而当前的 G7 刚刚超过 70%。虽然低于目前 G20 的 94.5%, 但我们注意到, 在投票规模缩小了 60% 的情况下, 这是个相当大的占比。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纳入目前不属于 G20 框架中的国家。我们注意到, 尼日利亚的经济已正式超越南非, 且人口规模是南非的近四倍, 其加入 G20 的呼声似乎相当强劲。当然, 当前的 G20 成员国是在 1997-98 年被挑选的, 相信未来 G20 将纳入类似尼日利亚及潜在的新兴市场国家。

G7+ 将作为当前 G20/1 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其议程专注于真正敏感的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我们建议 G7+ 的议题应该缩小, 重点关注至关重要的全球问题, 包括共享监管事宜。G7+ 和 G20/1 之间的关系将类似于联合国的当前结构, G7+ 将领导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形成有效的决策。当正式协议签署, 需要更广泛的重要国家群体参与时, 现有 G20/1 仍将发挥必需的重要支持作用。

3.可行性

就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的唯一代表而言，它确实有意义且提供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的尝试。如果欧元区国家认真对待自我承诺而保持单一货币，那么在讨论经济失衡、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问题时，也应该与在其建立银行业联盟和欧洲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监控框架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一样，保持一致行动。我们的调查还发现，这一举动将会受到非欧元区的大部分国家的欢迎。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建议欧元区峰会应该就关于授权欧盟委员会或委员会主席参与 G7 或 G20/1 会议进行讨论。

最后，对于改革全球国际论坛的政治僵局，新兴经济体希望发达经济体带头；也许还需要另外一次危机才能促使当前 G7 成员就 G20 进行改革，为了避免此情形的发生，我们需要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唯一可信的组织，带头推动 G20 改革。

4.结论

是时候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在维护合法性的同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G7+将大大改善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功能，同时保持其代表性和合法性。此外，它还能向欧元区成员国提供向世界发出建立永久性货币联盟信息的途径。

我们的建议也可能被视为太理论、不现实，因为目前还没有哪家机构被认为有如此高的权威。此外，就这方面而言，谁的权威和力量能推动这种变化呢？世界领导人们似乎相信，只有另一个重大危机才能启动对当前全球治理框架的彻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需要证明，它是在非危机时期唯一能够推动这些改革的可信组织。等待另一场危机作为改革的催化剂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一次必须是不同的。

本文原题为“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eds a better G20 and a new G7+”。本文作者 Jim O'Neill 为 Bruegel 非常驻研究员，Alessio Terzi 为 Bruegel 附属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贸易增长减速:周期性原因还是结构性原因

Emine Boz, Matthieu Bussière 和 Clément Marsilli /文 刘兴坤/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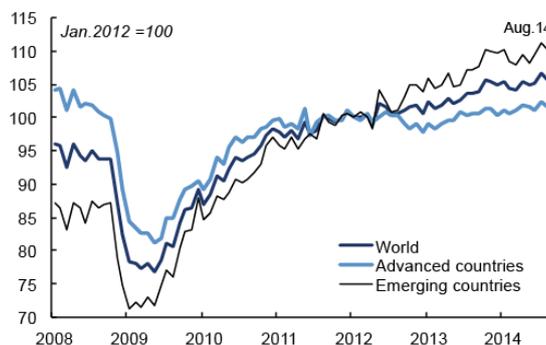
导读: 全球贸易增长经历 2008-2009 年“贸易大崩溃”后成功实现反弹, 但 2011 年转而明显减速, 2012 和 2013 年增长率仅为 3%。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贸易增长的衰退呢? 为此, 本文首先列举了部分贸易衰退的典型事实, 其中发达经济体下滑尤其明显, 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大多数区域也都受到影响; 其次, 运用贸易模型考察并发现, 大部分衰退源于周期性因素; 在结构性因素中, 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编译如下:

1、全球贸易增长减速的主要表现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 GDP 的增长。而因受危机影响, 全球贸易在 2008-2009 年经历了“贸易大崩溃”, 随后迅速实现反弹, 但是 2011 年再次转入下滑周期, 2012 年和 2013 年的增长率仅为 3%, 而危机之前 (2002-2007 年) 的增长率为 7%。全球贸易增长减速的突出表现是, 其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 GDP 的情况。

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首先, 发达经济体的缩减幅度严重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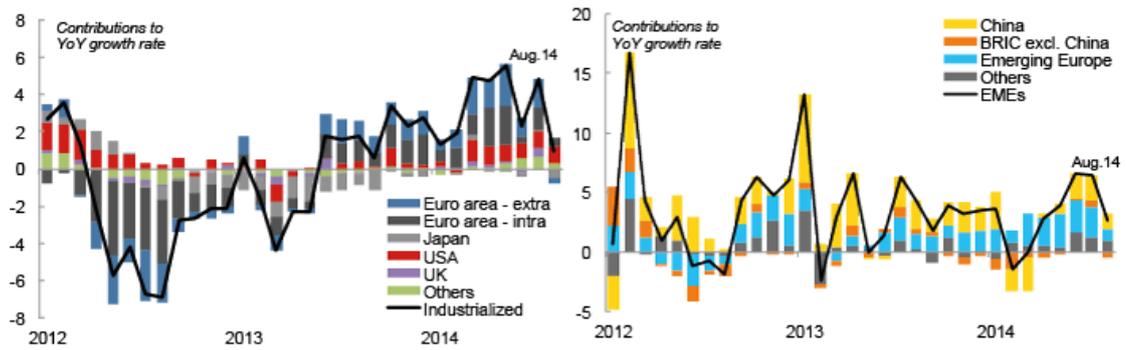
图 1 世界商品贸易量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CPB。

其次, 在这两个区域,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缩减程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 (如图 2)。在发达经济体中, 欧元区 2012 年的贸易增长尤为缓慢, 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区域内贸易的下滑, 但是区域外贸易也同样制约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 欧洲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相对疲软, 尤其是 2012 年, 这可能源于欧元区经济增长低迷所产生的溢出效应。鉴于全球贸易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发达经济体贸易的下滑, 接下来的分析选用了 18 个 OECD 国家作为样本。

图 2 世界商品贸易：区域结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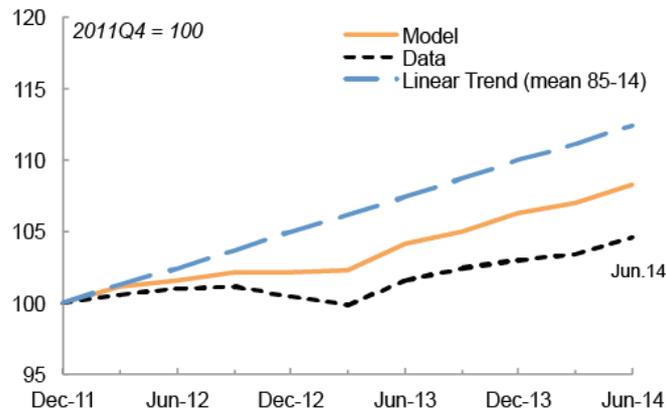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各国国民经济核算及法国银行工作人员核算。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贸易增长的减速呢？鉴于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于发展前景展望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有必要准确识别二者的影响。如果贸易减速纯粹源于近几年经济活动的低迷，那么预计的产出增长上升将会促进贸易增长的反弹。然而，贸易增长减速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诸如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球生产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变革。如果这些因素发生作用，那么世界贸易和全球 GDP 的动态变化将会是永久性的，并且通常被用于全球预测的经验法则弹性也将不再准确。

2、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

本文运用进口密度调整的需求（IAD）来估计进口弹性，结果显示，对于 18 个 OECD 发达国家，其很好地模拟了进口增长的减速。为了更好地理解周期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全球贸易增长，本文分别根据实际数据计算了累计进口的增长率，通过模型模拟了累计进口的增长率，计算了进口的历史平均增长率（如图 3 所示）。从中可见，历史平均增长率产生的累计增长率为 13.2%，模型预测的增长率为 8.6%，实际观察到的累计增长率为 4.6%。实际观测值和历史平均值之间 8.6 个百分点的差异中，周期性因素占了 4.6 个百分点（即 54%）。

图 3 累计进口增长：数据、模型和线性趋势



3、非周期性因素的影响

非周期性因素难以量化，无法与周期性因素进行比较。本文主要讨论了全球价值链和贸易保护主义两个方面。此类“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原理如下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以明显高于世界GDP的速度增长。关于这一发展的一个假设是，贸易自由化强有力地刺激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几十年的贸易增长，这不仅促进了直接出口的增长，并且促进了产品生产过程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散。具体来说就是，产品不再是在一国生产而出口到另一国，而是历经更加复杂的价值链，其中零部件在一国生产，组装在另一国完成，并最终出口到第三方的消费国。一些人担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并且生产者已意识到全球生产链条太长而导致效率较低，这一国际分工模式可能会走向终结。

•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有赖于投入产出表，该数据长期滞后，可以获取的最近数据也只是2011年的数据。因此，对于最近的贸易增长减速，我们只能对全球价值链贸易进行近似估计。世界银行的一项近期研究（Ferrantino 和 Taglioni, 2014）用“进口的中间产品”近似地代替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贸易曾经是导致“贸易大崩溃”的驱动因素，因为其下滑幅度远超过总贸易的情况。然而，在近期的贸易增长减速过程中，全球价值链贸易反而趋于增长。因此，全球价值链贸易不是阻碍近期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

• 贸易保护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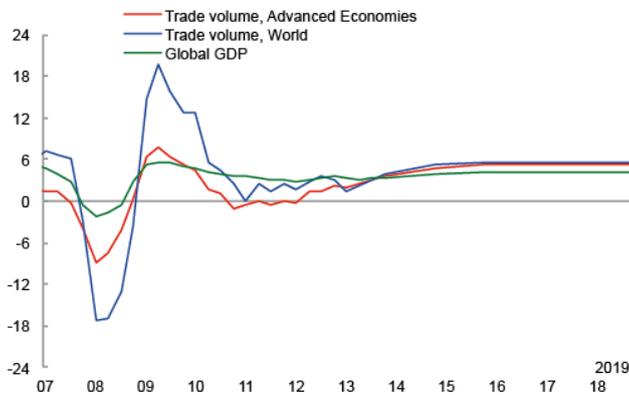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the Global Trade Alert, GTA）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统计、WTO关于新型进口限制措施所覆盖的贸易数据的统计，以及世界银行发布

的临时贸易壁垒数据库（Temporary Trade Barriers Database, TTBD），在近期的全球贸易增长减速时期，贸易保护主义趋于小幅上升。虽然难以达成确定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在最近 2-3 年内，贸易自由化并不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不及世界 GDP。

4、结论

最近的 IMF WEO 预测，2019 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和实际 GDP 增长率分别为 5.6% 和 4.1%（如图 4 所示）。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长将会结束目前的低迷状态，转而步入复苏，并再次超过 GDP 增长。全球贸易应该主要得利于预期的发达经济体投资的增加。

图 4 世界贸易和实际 GDP 的增长：WEO 的预测（同比增长）



很明显，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影响全球贸易的周期性因素将会逐渐消失。对于非周期性因素，本文认为，如果有迹象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加剧，那么它可能会阻碍全球贸易增长。与之相反，全球价值链贸易可被视为针对政策措施难以应对的结构性变化的一种最优的选择。

本文原题为“Recent slowdown in global trade: Cyclical or structural”。本文作者 Emine Boz 为 IMF 研究部经济学家，Matthieu Bussière 为法国银行经济学与国际和欧洲关系局副局长，Clément Marsilli 为法国银行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PEC 之自由贸易协定争夺战

Jayant Menon /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尽管 WTO 上的贸易对话面临崩溃，APEC 峰会继续推动了全球贸易协定的确立。本文认为，中国与美国正对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展开“争夺战”。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将面临中国主导的“北京纲领”的挑战。然而，文章认为，二者之间的争夺战不是解决办法，只会对全球贸易带来混乱和不稳定。编译如下：

中美两国正就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的主导权展开争夺。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FTAAP）是否可行，这一问题自 2006 年起就悬而未决；中国希望利用本次 APEC 峰会东道主的身份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FTAAP 事关重大，它或将覆盖全球 60% 以上的贸易量。

然而，如果 TPP 能够被确立，抑或能够表现出稳定、可信的前景，那么美国就将在 APEC 上借势订立贸易条约。反之，中国则将提出“北京纲领”来构建环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在这其中，孰者能够成为主导，将决定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如何进行。

对于 TPP 的成员国而言，它们很难忽视对于 FTAAP 的可行性探讨；而对于美国是否能够阻止中国提出它的协定方案则是众说纷纭。美国为 FTAAP 设立了一个计划，即在 2025 年前完成其确立；尽管计划并不可靠（TPP 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设立这样一个时间表意味着它被提上了日程，而这将分散对于 TPP 的注意力。

那么，FTAAP 会比 TPP 更容易达成协议吗？如果说 TPP 面临来自不同国家多样性的冲击，那么 FTAAP 无疑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后者比前者多涉及了 9 个国家。当然，这样一个“大”的团队也有其优势：它的涉及范围更广——比之 TPP 它包含了中国，比之 RCEP 它包含了美国，因此更有可能使得这样一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条约得以获得认可。

尽管 APEC 成员国具有多样性，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迎接贸易改革的部分 RCEP 国家，APEC 将不将其纳入考虑；这包括印度、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至于其他参与国，诸如俄罗斯、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带来了自身面临的挑战；而中日、美俄关系问题，以及在中国南海领土上的争端，也同样重要。因此，中日双边会谈是否会在领导人峰会前举行还并不明朗。

当然，APEC 的目标不会像 TPP 一样因其过高的标准而难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提议的“野心”越小，越能够抵消因多样性带来的约束限制。根据 TPP 谈判的进程以及 WikiLeaks 上的信息，如果 TPP 将在不久后达成协议，那么它将是一份折中的、妥协性的条约。如果是这样，它还是否能成为环太平洋贸易条约的

基石？过早地催熟 TPP 协议只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TPA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固然是 TPP 条约签订的一大条件，但它显然不够充分。

1、我们能期待什么？

如同在 11 月 2 日的华尔街期刊中所言 (Davis, 2014)，APEC 和北京纲领很有可能去掉那些不合适的提议。尽管自 1989 建立之初以来，APEC 的成果平平，但它总是与 WTO 保持一致乃至互相加强其影响力。APEC 主要通过支持那些非联合的单边措施来执行其自身的行动计划。尽管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可行性，但需要注意如何防止“搭便车”现象。

究竟是由美国还是中国来主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尚不明朗。这意味着世界贸易体系依然是碎片化的：TPP、FTAAP，抑或 RCEP 只是其中最大的几个碎片。此外，我们还有欧盟，它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与美国、非洲经济共同体、太平洋联盟及其他独立的“碎片”分割了整个贸易图景。按照最既定的理想进程，这些条约都被确立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成功，不妨说是一团乱麻，带来了不一致性和混乱。

2、多边化的结果

缺乏对于 WTO 的复苏和改革 (Baldwin, 2013)，将亚太地区建立自贸区的种种方案进行单方面地多边化是解决碎片化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这将包括通过继续在非联合的单边措施里走向 FTAAP。

对于亚洲而言，我们发现，绝大多数 RCEP 国家超过 75% 的进口是由 FTA 覆盖的 (Menon 2014b)。因此，与其他国家讨论那一小部分贸易份额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多边化带来的优势远远超过那些“互惠协定”，在亚洲便是如此 (Menon 2014c)。这还没有考虑其对于诸多 FTA 协定及其条款源流的管理成本。

3、结论

虽然几乎三分之二的自由贸易协定来源于单边行为 (World Bank, 2005)，“单边主义下的多边化”带来了希望。FTA 成员对于多边化的抵触也已大大降低。这或许不是一个最明智的方法，但却是当下较为可行的方案。

本文原题为“APEC and the ‘battle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本文作者 Jayant Menon 为亚洲开发银行地区经济一体化研究室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VOX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QE 退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有限

张明/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2014年10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停止继续购买长期国债与MBS，意味着美联储已经迈出退出QE的第一步。这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笔者认为，尽管目前中国尚未收到全面冲击，但是中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准备。编译如下：

尽管美联储退出QE给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显著冲击，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外部冲击才刚刚开始。随着美国退出QE以及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国外对资本流动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强化。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很可能面临短期资本流出显著上升的局面，这将给中国金融稳定与人民币汇率造成冲击。如果未来几年中国资本账户加速开放，那么这将放大短期资本外流造成的负面冲击。

自2008年底推出量化宽松（QE）政策以来，历经近六年时间，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终于落幕。2014年10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停止继续购买长期国债与MBS。关于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常规化的第一只靴子已经落地，市场的注意力转为美联储将会在何时加息。目前市场预测的中值是2015年中期。

从2013年第二季度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宣布即将退出QE以来，美联储退出QE的节奏就一直牵动人心，这无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是全球金融市场都产生了显著冲击。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在美联储实施QE期间，大量短期资本由美国流向这些国家，造成本币汇率升值、股价房价齐涨与经济增长强劲，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然而随着美联储转为退出QE，这些国家就普遍面临短期资本大举流出的冲击：本币对美元剧烈贬值、国内资产价格显著下行、经济增速迅速走弱，部分国家甚至面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然而，考虑到目前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经常账户的稳健性还是对外负债的规模，都显著好于19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因此，尽管个别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是存在的，但新兴市场经济体爆发大规模危机的概率依然较低。

对全球金融市场而言，尽管美联储已经开始退出量化宽松，但欧洲央行今年以来连续两次调低基准利率，并计划实施更大规模的QE。日本央行仍在实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且最近再次加大量化规模。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生的显著分歧，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在2014年上半年低估了美联储退出QE造成的冲击，从而形成了汇市、股市与债市三市齐升的罕见格局。然而，从2014年第3季度开始，随着全球宏观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行、局部地缘政治

风险的加剧，市场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加速退出 QE 可能造成的风险，这进一步造成了如下结果：

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股市的大幅回调。在 2014 年 10 月，欧美日股市均显著下行，美国股市更是丧失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跌回 2013 年年底之前的水平。发达国家股市的大幅回落，一方面是过去几年大幅上涨的自然回调，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下降。

结果之二，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持续走熊。2014 年上半年，除原油之外的其他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均显著下跌，其中煤炭与铁矿石的跌幅尤深。下半年以来，原油与黄金价格也出现新一轮下跌。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一方面给大宗商品出口国造成了严重挑战（例如巴西因此在 2014 年第 3 季度出现了负增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也令人堪忧），另一方面在给大宗商品进口国带来贸易条件改善这一好处的同时，也加剧了部分经济体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例如欧元区）。

结果之三，是美元汇率显著升值。尽管联邦基金利率仍然处于低位，但美联储削减购债计划已经造成美国中长期利率开始上行，再加上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这造成短期资本重新回流美国，从而推动了美元汇率的升值。近期除人民币依然对美元保持强劲外，其他大多数货币都对美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

尽管美联储退出 QE 给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显著冲击，但这一过程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是有限的。

首先，从贸易渠道来看，美联储退出 QE 将会造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放缓，从而降低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然而，美联储退出 QE 本身意味着美国经济正在显著走强，因此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也会相应上升。事实上，2014 年第二、三季度中国出口表现强劲，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对美欧的出口上升。换句话说，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改善将会对冲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下降。

其次，从资本流动渠道来看，美联储退出 QE 事实上也造成了中国面临短期资本流入的下降甚至逆转。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了 816 亿美元的逆差，这与 815 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几乎抵消。但与其他已经全面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出规模相对较小。事实上，如果未来的短期资本流出进一步放大，中国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的方式来加以应对。

然而，尽管美联储退出 QE 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我们也不应对未来的外部冲击掉以轻心。事实上，笔者认为，美联储退出 QE 的负面冲击，可能远小于未来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换句话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外部冲击才刚刚开始。

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以及外部需求的持续疲弱，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些潜在风险正在上升，例如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因为制造业与基础设施行业的产能过剩而显著上行，这无疑会降低国内居民与企业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随着美国退出 QE 以及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国外对资本流动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强化。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很可能面临短期资本流出显著上升的局面，这将给中国金融稳定与人民币汇率造成冲击。如果未来几年中国资本账户加速开放，那么这将放大短期资本外流造成的负面冲击。对于这一可能情景，中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准备。

本文原题为“QE 退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有限”。本文作者张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刊于世界经济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未来贸易谈判中的国企问题

Hejing Chen 和 JohnWhalley/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未来中国将在多个区域及双边贸易协议中有所作为，在这些谈判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本文着重讨论四个在谈判中重要的子问题，分别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反垄断法；国有企业在政府采购协议中的地位，国企、私企相对力量的改变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以及国企补贴问题。编译如下：

中国未来在多个区域及双边贸易谈判中都有望取得进展，这其中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及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多国达成的区域经济伙伴（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协议。由于中国长期给人以国有企业一支独大的印象，并且国企又往往被认为具有很强垄断力量，因此国有企业的相关议题是未来谈判中不可避免的。

本文着重讨论国企相关的四个具体子议题，包括：

- 针对国有企业的反垄断法及具体操作问题
- 未来国有企业在政府采购协议中将扮演的角色
-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中国同意以“非市场经济”身份加入。如今随着国企、私企相对力量的改变，这一身份定位能否发生变化
- 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补贴问题

1、针对国有企业的反垄断问题

中国的反垄断法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共分为 8 章 57 条，主要内容的制定是参照欧盟和德国的竞争法以及美国的反垄断经验而制定的。具体章节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里面有专门针对行政性垄断（第五章）的规定。目前具体执行反垄断法规的有三个主要部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简称发改委）、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和商务部——这三个部门各有分工，但同时又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协调下进行合作。其中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发改委将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工作。

尽管有明确的执行机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目前在中国真正进入到最后执行阶段的国企反垄断案件还是屈指可数。举例来说，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国家工商行政总局立案调查的反垄断案件接近 20 起，这其中涉及省份包括浙江、辽宁、江苏、江西、河南等，牵涉行业主要包括混凝土、水泥、汽油及汽

车。但由于案件牵涉较广，一些其他行政部门的干预，同时有关部门人员缺乏处理类似案件经验，导致最终真正执行环节显得相对薄弱。

未来中国如果要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议，那么不可避免的会有更多竞争条款。此外如果同欧盟和美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对中国反垄断法执行力度的要求一定会相应提高，尤其是针对国有企业。

2、国有企业在政府采购协议中的地位

中国目前尚未签署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但如果中国能尽早加入进来，无疑会给双边谈判提供一个有效的合作框架。

GPA 的谈判核心在于各国所能允许的开放范围，这必须同时符合计划加入国家和 GPA 成员国双方的预期。而中国目前复杂的政府架构以及庞大的国有部门，都会给谈判带来一定难度，尤其是在具体中央采购实体名单以及对国企采购单位开放的项目类别上，可能存在较大分歧。

目前中国政府采购法规的司法权归由财政部，但并非所有国企的政府采购都由财政部管理。事实上，GPA 涉及三个层面的采购主体：中央有关部门；省级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公共主体。其中中央和地方层面的政府购买很大程度上脱离财政部管理，而是更多地受中央其他部委的影响（如：发改委、国资委以及工信部等）。这种政府机构的内部协调问题将使得未来涉及国企 GPA 的谈判带来难度。

3、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及国企发挥的作用

近些年中国不断卷入美国、欧盟等地的反倾销调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美国、欧盟等国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份额过大，不应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允许其他 WTO 成员国在 2016 年前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反倾销调查方面。因为一旦反倾销案调查发起国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判断是否构成倾销时，将使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作为参考。对应于中国的情况，常见的做法是引用土耳其或是墨西哥的成本数据估算所谓的“正常价格”，而非中国的相应原始数据，以确定倾销幅度。这样做的弊端是忽视了中国与上述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巨大差异，因此自然常常得出中国以低于正常价格进行倾销的调查结论。

中国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但是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势必遭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考虑到国有企业与政府间千丝万

缕的联系，以及改革政策的落实情况，未来中国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有一定难度。

但随着私有部门在我国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应“非市场经济”部门比例也会相应降低。同时此次金融危机也暴露了美国、欧盟等国内部的国企问题，这将有利于下一步谈判的推进。因此，随着为期 15 年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期，2016 年中国有望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将深刻影响到此后中国和 OECD 国家间的谈判。

4、国企补贴问题

中国以往的国有企业补贴，就资金用途来说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补贴亏损国企以维持其继续运营；二是用于国企的私有化或重组；三是用于培植重点国企。

用于挽救亏损国企的补贴曾一度占据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 1999-2001 年间，当时几乎国企有将近一半都处于亏损状态。但随着国企份额不断下降，这一补贴也从 1985 年时政府支出的 25% 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2%。而逐步取消对亏损国企的补贴也是中国在 2001 加入 WTO 时所做出的承诺。

至于第二类补贴——用于国企私有化或重组，这一数字尚不公开可得。

第三类——用于补贴重点国企。重点国企主要是指目前数百家盈利情况很好的大型国企，其中有 190 家属于“央企”，由国资委直接管理。这些重点国企不仅能够直接获得政府预算资金，还能从国有银行拿到低息贷款。

就上述三种补贴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来看，前两种补贴影响较小，例如给亏损国企的补贴更多只是在勉强维持其运营，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不具国际竞争力，因此对出口影响很小。受到其他国家关注最多的是第三类补贴——即对大型国企的补贴，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与其他国家产品会在国际市场或是中国本土市场上形成直接竞争关系。

近年来中国在发达国家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反补贴调查，下一步的贸易谈判中，补贴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5、结论

自中国与冰岛、瑞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下一步中国还将与更多重量级的贸易伙伴进行磋商，谈判内容也将不再局限于商品、服务领域，而将拓展至投资、竞争规则、知识产权、环境问题、技术合作、政府采购等多维议题。相比之下，商品、服务方面的谈判会更加容易，因为这主要只涉及关税谈判，易于量化，而后续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谈判则需要一个整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针对本文讨论的四个有关国企子议题，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在各个子问题间寻求平衡。例如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可以通过在国企反垄断法方面做出部

分妥协，或是在政府采购协议中扩大准入范围，以换取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将减少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由此带来的好处将十分可观。

本文原题为“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sues in China’s prospective trade negotiations”。
本文作者 Hejing Chen 为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博士后，John Whalley 为西安大略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重新校准对中国的态度

Christopher K. Johnson /文 李想/编译

导读：美国的再平衡进程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作者认为美国需要在经济和其他非安全问题上下功夫，以此为契机解决棘手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三大具体措施：利用 APEC 峰会和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让中美关系回归正轨；重视双边投资协议；落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编译如下：

要想将再平衡进程持续到 2015 年，美国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与此同时，美国要消除亚洲国家的疑虑并让中国领导人明白美国将坚守对该区域的承诺，不能加剧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在整体战略上，美国政府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关于太平洋紧张局势和其他安全问题所采取的传统态度和暗示并不买账，至少其回应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默许中国的新政策方针，但这是一个好时机让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停下来反思，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事态度是否应该有所调整以及如何调整。

在更为战略性的层面上说，美国绝不应错过 2014 年底亚洲一系列峰会的机会。就其与区域邻国关系这一问题，中国的态度显著缓和。不管是习近平成功访印，还是中日敌对关系缓和，这些都至少能够表明北京方面正处在一个攻击性较低的时点。相对而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尚未完全经受检验，习主席迫切希望在 APEC 峰会上以主人的身份向该区域最重要的领导人展示他的外交智慧。有经验的美国外交官将试图塑造区域环境，将这种缓和的趋势延续到下一年。

这样的对华战略要求美国政府对再平衡进程中的经济和其他非安全元素投入大量精力。考虑到中美关系中存在大量棘手的安全问题，对其他领域的强调将为建立双边战略信任创造最好的机会，以此促进在棘手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下三大支柱是加强这一战略最为合理的政策工具。

- 利用 APEC 峰会和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让中美关系回归正轨。

许多中国战略学者认为这次峰会对奥巴马政府余下任期内的双边关系有着关键作用。今年的战略和经济对话没能够作为政策跳板为峰会的成功铺路。继今年夏天在两国首都的见面之后，秋天都各自集中精力应对国内重大问题，几乎没有时间来思考改善两国关系的政策方法，所有这次对话的结果只是一系列平淡的宣言。除去在气候变化和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进展，美国政府也应当给中国一些意料之外的支持，比如支持中国对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提议，至少不要对此唱反调。

- 在双边投资协议上下更多功夫。

在去年秋天分水岭式的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背负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支持双边投资协议。美国方面应该通过实际行动更清晰明确地感谢中方的支持态度，同时推动磋商。美国应该从对协议空泛的热情转向明确中国所愿意接受的实际让步。双边投资协议是美国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轨迹的最好机制，而经济改革对解决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 落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如果 TPP 不能成功落实，亚洲将无法对美国的再平衡进程建立信心，因为 TPP 反映了美国对抗中国的具体政策。它可以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相信他们不需要专门提防中国经济，同时让中国人认识到就像十年前加入 WTO 一样，TPP 或许是进行国内改革更为有利的方式，而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改革是迈向繁荣的必经之路。

尽管人们对美国再平衡进程的进展有所担心，但其在亚洲依然有着很好的领导地位。美国数十年来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带动了亚洲的经济增长、安全稳定和共同价值的传播。今天很多区域性国家向中国寻求经济增长，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国来保障区域安全。因此，区域盟友、伙伴国和竞争者都承认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领头势力，它有能力实施其再平衡战略。

再平衡进程的实施需要美国维持它长期稳定的政治关系、稳健的经济纽带，不可企及的军事能力以及与大多数区域国家的共同价值。尽管亚洲对美国及其在这一区域的再平衡的能力有所疑虑，2015 年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亚洲各国证明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参与不仅会继续，而且会加深。

本文原题为“Recalibrating on China”。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K. Johnson 是 CSIS 高级研究员和中国研究主席。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发表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维也纳会议后伊朗核问题的前景和障碍

Richard Dalton /文 杨原/编译

导读：11月18日至24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在维也纳开始举行。此轮谈判是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商定期限内的最后一轮谈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此次会议后伊朗核问题的前景如何？还存在哪些障碍和挑战？查塔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理查德·道尔顿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应当取消——而不仅仅是暂停——对伊朗的制裁，同时找到一种非歧视性的解决途径。编译如下：

目前对11月24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谈判主要有三方面的评论：一是谈判取得了进展，二是依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三是谈判有望最终获得成功。这些评论都没错，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美国、伊朗及其他相关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使伊朗核问题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为了确保未来伊朗核技术发展的和平性，谈判各方就以下一些原则或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接近于达成共识：实现伊朗核计划的完全透明以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高标准；对核燃料浓缩的百分比做出限制；削减伊朗境内浓缩材料的库存；不对乏燃料进行再处理；设法对阿拉克研究反应堆做出修整以使其仅可生产最低数量的钚；设法消除福尔多地下工厂从事有军事目的的核浓缩的风险；使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某些可能的军事方面核技术的研发工作所开展的调查最终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不过，正在起草的全面联合行动计划必须符合2013年11月签署的关于伊朗铀浓缩能力的指导性文件中所提出的要求，充分考虑伊朗的实际需要，同时取消——而不仅仅是暂停——对伊朗的制裁。然而目前存在着两方面的矛盾。

一方面，伊朗曾被许诺说，只要它遵守它所做的保证，联合国和美国国会法案对其所施加的制裁就将被取消。然而，现在如果伊朗得不到比这更可靠的担保，它就很可能不愿对其所拥有的可操作的离心机的数量（9400台）以及其铀浓缩的能力做出不可逆的改变。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伙伴则坚持伊朗必须首先显著减少其离心机的数量和铀浓缩能力，然后再据此延长其做出进一步突破所需要的时间。美方已经表示，谈判各方都认为，最终达成的协议需要考虑双方的立场。

所以现在存在的问题都是政治层面的：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能否超越其直觉和长期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带给他的消极印象，相信美国政府能够说服国会取消对伊朗的一切与核问题相关的制裁，而不仅仅只是暂停这些制裁？而如果它能够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他的这种信念又是否足够坚定，从而能改变其原

有的有关伊朗铀浓缩能力最低要求的主张（至少保证现有的布什尔核反应堆运转一年）？

尽管以国际标准来看，伊朗所希望拥有的铀浓缩能力如果用于民事发电的确不算太过分，但美国、以色列及“P5+1”机制部分国家依然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如果伊朗拥有它所希望的浓缩能力，它将一直保持在约两个月内完成足够的裂变反应并制造出核武器的可能性。其实，如果最终的解决方案能够达成，那么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因素是能够为伊朗的核走势提供强有力的保险的：首先，裂变材料以气体形式累积后实现武器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伊朗在做出仅以和平方式利用核技术的承诺后，再出尔反尔将不符合其国家利益；再次，国际原子能机构还会依据伊朗保障协议的附加议定书对伊朗实施监督；此外，美国及其盟友还可以继续威胁伊朗重新对其实施制裁并以此威慑伊朗。然而，美国、以色列等国依然坚持要求伊朗进一步削弱其核潜力，延长其将核材料武器化的时间。

对于与伊朗谈判的各方来说，应当在一段过度时期之后，寻求一种非歧视性的解决途径，保证它们对伊朗所提的要求与《核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普适性标准相一致。否则，目前已经实现的一定程度的透明化以及对伊朗核计划的已有的一些限制将有可能得而复失，实现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促进应对共同安全挑战的合作也将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本文原题为“After Vienna: Obstacles to a Nuclear Deal Can Be Overcome”。本文作者理查德·道尔顿（Richard Dalton）2002至2006年任英国驻伊朗大使，现为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副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11月27日发表于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PEC 峰会体现定义亚洲地区的困难

肖恩·布莱斯林/文 高歌/编译

导读：2014年11月12日，英国著名智库网站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刊登了题为《APEC峰会体现定义亚洲的困难》的文章。学者布莱斯林在文章中指出，对亚洲地区的定义实质上体现的是这一地区的权力争夺，而真正有效的区域治理应当依靠功能性机制的作用。编译如下：

中国举办了今年的 APEC 峰会，这次盛大甚至铺张的会议，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握手，鉴于最近的中日关系，这一握手尽管毫无温度，但已经是可期待的最好结果了。而这一外交细节也提醒了人们在区域中达成任何可行的一致仍然是如此艰难。但它起码也表明这种会议使领导人不得不进行某种形式上的正常接触，与此同时，美中之间通过北京峰会在解决双边贸易问题上取得的进展也说明看似只有空谈的峰会也能有一些成果。

1、一体化的梦想

习近平利用这次机会提出了“亚太梦想”，即建立在整个亚太自由贸易区基础上的更加紧密的区域一体化。

中国的这一新计划不仅是出于经济的逻辑，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对中国而言，由智利、新加坡和新西兰（以及之后的文莱）发起的自由贸易谈判在美国于 2008 年加入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于美国始终要保持自己在亚洲地区的“枢纽”地位，现如今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议程，就开始有了故意要削弱中国的政治意图。其方法是将中国排挤在新的贸易框架之外。因此中国需要促成一个相对应的合作框架，使中国不仅不会被孤立在外，还要在其中担当核心作用。

但是正在协商之中的自由贸易计划并不只有上述两种，第三个版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包括了东盟十国以及与之有单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唯独没有美国。

2、存在主义的问题

现在亚洲存在的竞争既不是关于该区域应该怎样更好地治理，也不是谁应该在区域治理中担当领导者，而是在更加根本的问题上的竞争：亚太区域究竟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可以成为什么样。

对于区域的定义常常反映的是在一个给定的结构中，谁可以使用何种等级的权力。“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提出正是为了防止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很可能也没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偏好的“亚洲人的亚洲”的出现。

如果无法按照想要的方式定义“区域”，那么余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也不要让别人如愿以偿的定义区域。比如，中国想要的由自己主导的区域是东盟加三（中日韩），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加入形成东盟加六则会淡化中国的主导。将要加入的俄罗斯和美国又将再次划定区域的界限，结果将是原本可能形成的区域治理基础变成了类似与 APEC 精英机制的情况。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区域”——这一机制的建立试图阻止其他区域治理形式的发展。

难道地缘政治的考虑就意味着任由区域大国建立宏大而带有大国偏好的区域机制么？很有可能是的，但是这些大战略并非唯一的区域治理形式。

在二战之后，戴维·米特兰尼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和平体制”的视角，这种视角将寻求建立单一综合性国际组织的行为看成是一种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它们的顽固性、固定的成员国、僵化的惯例和严格限定的议题范畴，这些机构永远不可能有效运作。

米特兰尼给的方法是让现实问题推动合作的形式，建立许许多多成员国数量不定的国际组织，议程和运作方式也依情况而定。同时，在处理问题时，让技术专家拥有比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客更大的权利，效果将会更好。

在功能的层面上，亚洲已经充满了小规模机制，他们带动了切实有效的区域合作。在金融上，全球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促使区域内国家意识到加深政府间区域合作的必要。东盟也在广阔的东盟经济机制下发展了更广泛的合作。这些机制关注的是分散的政策领域，从而解决具体的功能性的问题，范围涉及农业、电讯、能源、运输、金融和恐怖主义等。而并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寻找一劳永逸得解决所有区域问题的方法上。

一方面，大国将继续在符合它们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关于区域的共识；领导人将继续在各类制度框架下举行会议来解决一些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会看到多种形式的关注具体领域的“功能性”区域合作的发展。这些区域合作的产生是对危机的直接反应。尽管我们不能否定前者，但后者才是有效的区域治理的基础。

寻求对亚洲地区单一的永久性的定义，以及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不仅是一种误导，更可能会事与愿违。

本文原题为“APEC Summit Shows How Hard It is to Define the Asian Region”。本文刊于2014年11月12日的Chatham Hous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官网，作者肖恩·布莱斯林是英国著名亚洲问题学者。 [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迈向新的正常化关系：美越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

恩内斯特·鲍尔、默里·希伯特/文 郭楚/编译

导读：2014 年 9 月 18 日美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表文章《迈向新的正常化关系：美越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作者回顾了美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给出在新形势下推进美越关系朝向更深入发展的建议。编译如下：

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将在 10 月初访问美国并与克里国务卿会见。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 2013 年 7 月访问美国时，双方提出建立越美全面伙伴关系，这次会谈将为深化这一双边关系、丰富关系实质内涵提供机会。在走出越南战争和双边多年的激烈对抗之后，2015 年将迎来美越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美越两国领导人采取具体行动推进双边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条件已具备，而为达此需要互信和相互尊重。

加强合作的坚实基础已经具备。美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对方首都相互设立了大使馆，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美支持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国领导人互访，两军也加强了安全合作。美国支持越南加入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谈判，两国间还达成了和平使用核能的协议，即“123 条款协定”。

当前，美国决策者认为越南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亚太国家。在持续调整和变动的亚太格局下，华盛顿和河内在地缘政治、安全问题和经济发展等议题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两国对捍卫公海航行和商务自由存在共同关切，反对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确保海洋争端的和平解决。

自从美 1994 年取消对越贸易制裁之后，美越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得到不断强化。到 2013 年，双边贸易已达 250 亿美元。美国现在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七大投资国。两国目前每年有以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为议题的两个副部长级对话机制。两国官员定期会面讨论双边关系中最棘手敏感的人权问题。华盛顿和河内也已经开始展开工作解决有关越南战争的遗留问题，其中包括处理由于使用橙剂所遗留的二氧化杂芑的影响、清理仍遗留在越战场上的未爆炸武器。

不可否认，越南对邻国中国的战略防范是越评估越美关系应发展得多块、发展到何种程度的重要参考因素。但中国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日益坚定和强硬的立场使越南领导人认为越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来保障他们的战略利益。与此同时，越对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度和实质的疑惑也防止了越南与美关系发展得过快，尤其是在军事合作领域。尽管如此，美越双边关系发展前景却是一片光明，虽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也不无挑战。通过过去 20 年的共同努

力，越南和美国已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和理解，这使双方超越过去、展望未来成为可能。在美国和越南准备着手纪念双边外交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之际，美越在推进双边关系向着更新、更深化的方向发展有着坚实的国家利益基础。两国高层领导应指令各自政府采取必要措施落实以下建议，包括指定两国的政策执行负责人、完善落实政策的配套支持手段等。

美国和越南应该做到：

- 奥巴马总统应利用在 2015 年 11 月出访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参加年度经济和安全峰会之机，承诺访问越南以庆祝美越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
- 双方讨论确定在越南采取美国所期待的何种政策之后，美国逐步放宽、并最终取消对越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限制。
- 美越加强海军接触和合作，包括人道主义和救灾演习，加强协作能力，以及为美舰船在越提供补给和维修。
- 美有关政府部门与越南公安部就人权问题建立对话机制，以解决关于越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越应放宽国际人权组织赴越参访门槛。
- 美越与谈判伙伴共同努力结束 Tpp 谈判并签署协议，在东亚峰会机制内合作，共同发声以亚太自贸区（FTAAP）为框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 美越加强合作，争取取消越南的非市场经济国地位，以展现双边关系提升的重要精神。
- 2016 年以前完成对岘港二氧杂芑的清理工作，制定出清理边和市（Bien Hoa）前空军基地二氧杂芑的可操作性时间表。
- 建立美越年度“一轨半”战略对话机制，以探讨进一步发展美越关系的构想。

本文原题为“Moving toward a New Normal: U.S.-Vietnam Relations at 20”。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 CSIS 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恩内斯特·鲍尔、默里·希伯特。本文刊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 CSIS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